

· 热点研讨——宣传研究邓小平 ·

改革开放以来国外邓小平军事思想与实践研究述评

张冬梅 孙文广

摘 要: 改革开放以来,国外邓小平军事思想与实践的研究出现了一批成果。相关研究热点主要集中于邓小平对时代主题的判断与实行国防和军队建设指导思想战略性转变、军队服从服务于国家建设大局、现代人民战争思想和实行积极防御的军事战略方针、建设一支强大的现代化正规化的革命军队、邓小平的革命战争生涯以及邓小平在新时期若干军事事件中的重要作用等。这些研究不乏真知灼见,但也存在研究不够充分、认识不够深入、观点不够准确的明显缺点。梳理国外邓小平军事思想与实践的研究状况,对于我们深化这一课题的研究,有着重要的借鉴和启示作用。

关键词: 邓小平 军事思想 国外学者 傅高义 《邓小平传》 《邓小平时代》

中图分类号: K827=7; E297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1009-3451(2014)03-0013-10

作 者: 张冬梅,第二军医大学卫勤系军事教研室副教授(上海 200433)

孙文广,南京政治学院军事思想与军事历史系讲师(江苏南京 210003)

随着当代中国改革开放和现代化建设全面展开,国外邓小平研究迅速兴起,涌现出众多具有重大影响的学者和论著。作为邓小平研究不可或缺的重要组成部分,邓小平军事思想与实践的研究在国外学界也受到重视。目前,学界对于国外邓小平军事思想与实践的研究鲜有系统梳理,更无专文阐述。有鉴于此,本文拟对改革开放以来国外邓小平军事思想与实践研究进行述评,以作引玉之砖。

一、国外邓小平军事思想与实践研究的基本情况

改革开放以来,国外邓小平研究持续开展并不断深入,学者们逐渐将对现代史、中共党史乃至毛泽东思想的研究延伸甚至聚焦于对邓小平生平、思想和实践的研究上来。粗略统计,仅翻译成中文的较为知名的论著就有30余部(篇)。国外学者较少专论邓小平军事思想与实践,相关研究大多伴随对邓小平的生平、思想理论及社会实践活动的研究一并呈现。据笔者所见,国外涉及邓小平军事思想与实践研究的代表作主要包括:

1. 美国迈阿密大学政治学教授德雷尔的论文《邓小平的军事思想》。该文是笔者收集到的唯一一篇专门从军事角度开展邓小平研究的文章,它发表在英国《中国季刊》1993年第135期,^①我国《国外中共党史研究动态》^②1994年第3期刊发了此文。德雷尔在文中总结了邓小平在新时期

^①《中国季刊》创刊于1960年,现由伦敦大学东方与非洲研究院主办,剑桥大学出版社出版发行,是国外当代中国研究领域最具权威的杂志之一。该杂志1993年第135期(又称秋季号),发表了邓小平研究的系列文章。

^②《国外中共党史研究动态》由中共中央党史研究室主办,1990年创刊,1996年停刊。

调整人民解放军政策的 7 个主要方面,具体为改变战略思想、强调军事训练、购买先进武器、提高军人教育程度、减少军队高级领导的党政兼职、增大军队在支援经济发展中的作用以及建设一支精干、年轻与快速反应的部队。他评价指出,使人民解放军现代化和专业化是邓小平留给后世的最重要遗产。^①

2. 英国外交家理查德·伊文思的著作《邓小平传》。理查德·伊文思在上世纪 50 年代中期曾担任英国驻华代办处政治参赞,任职期间将 1956 年邓小平在中共八大上所作的《关于修改党的章程的报告》^②传回英国。虽然当时身为年轻参赞的伊文思对邓小平知之不多,对共产主义和中国共产党也缺乏深入了解,但他却被邓小平的报告深深吸引,并对邓小平本人产生了浓厚兴趣。在此后 30 多年,特别是 1984—1988 年担任英国驻华大使时一直关注着邓小平,并于 1993 年完成《邓小平传》一书。在笔者收集到的资料中,该书是对邓小平军事生涯着墨最多的一本传记,并使用了如“长征(1931—1935)”“转战太行(1935—1945)”“逐鹿中原(1945—1952)”等军事色彩浓厚的标题。^③

3. 澳大利亚学者大卫·古德曼的著作《邓小平政治评传》。该书尽管标明是“政治”评传,但却辟出专门篇幅论证邓小平是一名军事家。作者认为,一方面,长期的军事斗争实践特别是从抗日战争开始,邓小平的“政治和组织才能变成了军事技巧”,使“他在解放军中很快赢得了优秀指挥员和领导人的名声”,^④同时也造就了他日后成为政治伟人的诸多因素;另一方面,邓小平在上世纪 80 年代提出了一系列有关治军的思想 and 举措。作为澳大利亚的中国问题研究专家,同时也是邓小平研究领域较有影响力的学者,大卫·古德曼曾任澳大利亚悉尼科技大学国际学院的教授、院长,以及《中国季刊》《共产主义研究》《太平洋评论》等刊物的编委。

4. 美国哈佛大学教授、费正清东亚研究中心前主任傅高义的著作《邓小平时代》。该书是本世纪以来国外邓小平研究的力作。2000 年,70 岁的傅高义从哈佛大学退休后,集中精力研究“当代中国的基础是如何从 1978 年开始奠定的”^⑤这一问题。傅高义认为“要想了解今日之中国,很重要的一点是了解历史,特别是自 1978 年邓小平开始领导造就了当下中国的一系列进程之后的历史”。^⑥倾尽 10 年心力,傅高义终于完成《邓小平时代》一书。在这部著作中,傅高义不仅对邓小平在革命战争年代的经历进行了描述和分析,还重点梳理了改革开放前后邓小平主持推进的八个方面的重要军事工作,并评价这些工作“给接班人留下了一支规模更小、教育水平更高、对现代战争的要求理解更深刻的军队,以及一个更强大的民用经济与技术基础”,^⑦从而为中国军队继续致力于现代化建设奠定了重要基础。

①[美]J·德雷尔《邓小平的军事思想》,《国外中共党史研究动态》1994 年第 3 期。

②该报告是中国共产党在苏共二十大后经过认真思考形成的。国内学者马启民在著作《国外邓小平理论研究评析》(济南:山东人民出版社,1999 年)中,综合理查德·伊文思的外交活动,以及日本学者和田武司在《邓小平传》(东京:日本德间书店出版社,1977 年)中的判断,认为邓小平引起国际关注的时间正是他在 1956 年中共八大上作该报告开始的。

③[英]理查德·伊文思《邓小平传》,田文译,北京:国际文化出版公司,2013 年。1996 年上海人民出版社出版的该书中,将这些标题译为“山中一兵(1935—1945)”“平原上的战士(1945—1952)”等,同样具有鲜明的军事特色。

④[澳]大卫·古德曼《邓小平政治评传》,田西如、李学谦、姜丽蓉译,北京: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1995 年,第 216 页。

⑤[美]傅高义《邓小平时代》,冯克利译,北京:三联书店,2013 年,“序言”第 1 页。

⑥[美]傅高义《邓小平时代》,冯克利译,“序言”第 1 页。

⑦[美]傅高义《邓小平时代》,冯克利译,第 505—531 页。

此外,其他一些对邓小平政治、经济领域研究颇有建树的国外学者,以及从事国际关系与当代战略方面研究的国外学者,也会在论述中或多或少地涉及对邓小平军事方面的评论,其中不乏真知灼见,如日本亚洲经济研究所主任调研员、中国经济问题研究专家小林弘二,东京都立大学教授冈部达味,美国芝加哥大学政治学教授、国民党元老邹鲁的儿子邹说,以及美国耶鲁大学教授保罗·肯尼迪等。他们的若干观点可视为对邓小平军事思想与实践研究的重要补充。

二、国外邓小平军事思想与实践研究的主要内容

国外研究邓小平军事思想与实践所涉及的范围较为广泛,既纵联邓小平辉煌人生的各个重要阶段,又横贯于战略指导、战争指挥、国防和军队建设等诸多方面。多数学者能本着尊重历史、尊重事实的治学精神,采取较为客观公正的态度从事研究。

1. 关于邓小平对时代主题的判断与国防和军队建设实行指导思想战略性转变。在对时代主题判断的问题上,日本学者小林弘二认为,邓小平“断定今后在客观上会有约二十年左右时间能避免世界大战的条件。”^①同时,国外学者还更加突出地强调了邓小平通过主观努力实现了中国自身的和平与发展。日本学者冈部达味等认为,“80年代邓小平时代的政治体制已经从克服危机为主要功能变成了以维持稳定和促进发展(特别是促进以经济为中心的发展)为主要功能的体制”,“既然中国把经济建设作为最大课题,它自己也就希望有和平的环境,而且成了创造这一环境的‘演员’之一”。^②傅高义也认为,邓小平通过对越自卫反击作战、与苏联缓和紧张关系、中美军事安全合作等做法,“达到了他的短期目标”——“中国有能力在未来10到20年内避免战争的危險”,“多争取一点时间不打仗”,“以集中精力发展民用经济”。^③

在国防和军队建设指导思想实行战略性转变问题上,小林弘二认为,邓小平“一百八十度的大转变”就是提出“以经济建设为中心目标”,取代毛泽东以战争危机为背景提出的“继续革命”。他指出,邓小平“认为必须通过不断的阶级斗争才能解决的矛盾,也许随着生产力的发展情况会有变化”,“这同一贯强调思想优先和‘主观能动性’的毛泽东的价值观相反”。^④傅高义则提出这一转变是“在邓小平认为同苏联交战的可能性减少后”发生的,他认为这一转变意味着邓小平要“推迟军事现代化”,把国家资源“转向其他三个现代化,尤其是陈云倡导的优先领域——农业和轻工业”。^⑤傅高义还提出,当时的中国军队普遍不能理解这一想法,因此邓小平必须“对失望的军官一遍遍做出解释,为什么首先发展民用经济、再搞军事现代化是符合国家利益的”,并指出邓小平“大概是当时唯一一个具有权威、决心、政治技巧能避免这些军官对政策发起严重抗议的领导人”。^⑥

2. 关于邓小平军队服从服务于国家建设大局的思想与实践。关于这个问题,傅高义着重讨论了中国军工企业的“军转民”。他指出,“邓小平甚至在三中全会以前就提出了这种战略(作者注:指军转民),他说,中国应当摆脱严格划分军事与民用产品这种无效率的苏联模式”,为此,邓小平

①[日]小林弘二《从毛泽东时代到邓小平时代》,[日]竹内实《当代中国的掌舵人》,张慧才编译,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1993年,第150页。

②[日]冈部达味、毛理和子《邓小平时代的特点和意义》,冷溶主编《海外邓小平研究》,太原:山西经济出版社,1993年,第13页。

③[美]傅高义《邓小平时代》,冯克利译,第517页。

④[日]小林弘二《从毛泽东时代到邓小平时代》,[日]竹内实《当代中国的掌舵人》,张慧才编译,第148页。

⑤[美]傅高义《邓小平时代》,冯克利译,第520—521页。

⑥[美]傅高义《邓小平时代》,冯克利译,第521页。

“鼓励地方军工企业和军队工厂生产更多有市场竞争力的民用产品”，“还要求军队把部分设备和技术转向民用经济”，“为单一军工向多样化转变提供机会”，“让内地的地方军工企业和军队工厂适应新的市场经济”，以及要求军用技术与民用技术的互相转化等。^①对此，德雷尔也注意到，“四人帮”垮台后，中国人民解放军政策的大变化之一就是“军队在支援经济发展中的作用增大”，认为“随着战争威胁的减少，军工生产线（往往开工不足）不仅生产供国内外消费用的食品、服装、家用电器，还制造供出口用的武器”。^②

上世纪 80 年代中国实行“军转民”举措的积极意义是显而易见的，傅高义深表认同。他指出，这一举措“减少了（作者注：军队）对政府财政的需求，满足了受到压抑的消费需求，使企业变得更有效率，改善了军官和普通士兵的生活条件，为复员军人提供了就业机会，使民用技术的进步及生产效率的提高能够被应用于改进军工生产。”^③而对于与“军转民”相伴随的军队生产经营所产生的消极影响，傅高义也触及到了，但评论却言过其实。比如他评论道，“1980 年代军队运作的商业化是个混乱无序的过程”，“把军队和私人利益搅在一起，也造成了腐败和贪婪的机会，背离了军队奉献于自身使命的精神”。^④显然，这夸大了中国军队服从服务于国家建设大局实践中出现的负面现象与不良后果，也是对改革开放以来中国军队始终忠诚履行职责使命这一客观事实的盲目忽视，是以偏概全。

3. 关于邓小平现代人民战争思想和实行积极防御的军事战略方针。傅高义认为，上世纪 80 年代后，邓小平实施了“扩大国防战略”。所谓“扩大”，傅高义认为有双重含义。一方面，邓小平不再坚持毛泽东时期“严重依赖于两种极端方式的结合：人民战争和核武器”，“开始考虑发展能防止战争升级为全面核冲突的有限核打击和战术核武器的可能性”^⑤；另一方面，“中国的军事领导人开始就中国的战略指导路线形成了共识，即不再被动的诱敌深入，而是准备进行更为积极的防御。”^⑥邓小平接受了粟裕于 1977 年提出的准备打一场“现代条件下的人民战争”的思想，也接受了时任军事科学院院长宋时轮对“积极的防御”的阐释，即在受到全面军事入侵的情况下，“解放军要用阵地战阻击敌人，使其无法深入中国腹地”，“不但要以步兵，而且要用包括空军在内的多兵种对抗敌人”，“要准备保护战场之外漫长的后勤补给线”，^⑦并依据这一思想对现有体制、训练和征兵方案进行了调整。而在未来战争的样式上，傅高义认为，邓小平判断“随着两极世界被多极世界所取代，小范围战争的危险却在增加”，因此“解放军要把计划和训练的工作重点放在中国周边地区的小规模冲突上”，“要针对边境地理和气候以及潜在对手的性质进行计划和战备”，“要用更多资金研发适合地区战争的关键技术，如坦克、大炮、航空电子设备以及指挥和控制系统”，并且“制定计划时的指导思想是邓小平所偏爱的速决战”。^⑧

关于这个问题，德雷尔也曾提出，邓小平改变了中国军队以往的战略，突出了阵地战、现代武器和各军兵种合成作战的作用。他说“诱敌深入以围歼敌人的思想，被补充成可以进行‘前方防

① [美]傅高义《邓小平时代》，冯克利译，第 528—529 页。

② [美]J·德雷尔《邓小平的军事思想》，《国外中共党史研究动态》1994 年第 3 期。

③ [美]傅高义《邓小平时代》，冯克利译，第 530 页。

④ [美]傅高义《邓小平时代》，冯克利译，第 530 页。

⑤ [美]傅高义《邓小平时代》，冯克利译，第 523—524 页。

⑥ [美]傅高义《邓小平时代》，冯克利译，第 524 页。

⑦ [美]傅高义《邓小平时代》，冯克利译，第 524 页。

⑧ [美]傅高义《邓小平时代》，冯克利译，第 525—526 页。

御’”^①这一看法与傅高义是一致的,也是合乎事实的。对于“各军兵种的合成作战”,德雷尔认为这一思想的实践来源是1979年对越自卫反击作战中暴露出的诸多问题,如“中国的步兵没有空中掩护,坦克之间的无线电通讯不畅,部队成纵队进攻,没有占领纵队间的中间地域等”。^②保罗·肯尼迪在考察中国进行武器现代化的动机时也指出,邓小平要“重新考虑沿苏联边境的‘前方防御’战略,使之有利于在漫长而无掩护的边界后面进行反击”。^③

4. 关于邓小平建设一支强大的现代化正规化的革命军队的思想与实践。邓小平军队现代化建设思想与实践,是国外聚焦的一个热点。美国学者邹说认为“邓小平的军事政策的要害是‘国防现代化’”。^④德雷尔曾总结了邓小平主导下的人民解放军七大政策变化,其中有5个方面是军队现代化的内容。^⑤德雷尔指出,为解释“四个现代化中,军事现代化居末位”的次序排列,邓小平做了很大努力,就是要让人民相信现代化的国防力量不能建立在落后的经济和科学基础之上。^⑥

在如何实现军队现代化的问题上,国外学者普遍认为邓小平重点对军队进行了整顿和精简。伊文思指出,邓小平在1975年恢复工作后,就批评“军队中派系林立,‘肿、散、骄、奢、惰’”,“军队人数虽然多,但是素质比较差”,“领导班子要抓紧整顿”,^⑦并认为“在这方面,他的任务是相当艰巨的”。^⑧古德曼在表达了同样观点的基础上还认为,“设法使解放军的经费得到控制,提高军队的效率,使军队干部年轻化,建设一支更加专业化技术化的军队”,^⑨是邓小平改革军队的目标,并认为邓小平由此实施了裁军百万、撤并军区、编成合成部队等重大举措。傅高义则认为,“虽然所有的军事决策都是由邓小平拍板,但他花费时间精力最多的还是裁减军队老干部问题”,并为此想了很多办法,如“鼓励地方单位为军队的退休老干部和服完正常兵役的人安排工作”,并保留老干部的政治和生活待遇,如“在1982年成立中央顾问委员会后,军队中的很多老领导成了该委员会的成员”。^⑩

关于军队现代化的实际效果,保罗·肯尼迪通过分析上世纪80年代后中国军队军事装备水平和军事演习规模与方式的变化,认为中国军兵种的合成化程度、海陆空作战能力都有了很大提高,“海军正用一系列新式舰艇装备起来,从驱逐舰、护航舰到快速攻击舰甚至气垫船。还建立了一支非常大的常规潜艇舰队,成为世界第三大常规潜艇力量。中国的坦克炫耀着激光测距仪,飞机已装备现代化雷达成为全天候型”。^⑪关于这一问题,傅高义却认为,由于邓小平觉得“军事现代化可以等一等再说”,因此“整个1980年代中国政府不断减少军费在预算中所占比例”,“考虑到1980年至1989年的通货膨胀,美国分析家估计这10年的国防预算名义上增加了,但军队可以使用的资金其实是下降了。”^⑫为此,邓小平“对发展海军的计划做了限制”,“甚至在十分优先的军事领

①[美]J·德雷尔《邓小平的军事思想》,《国外中共党史研究动态》1994年第3期。

②[美]J·德雷尔《邓小平的军事思想》,《国外中共党史研究动态》1994年第3期。

③[美]保罗·肯尼迪《大国的兴衰》,蒋葆英等译,北京:中国经济出版社,1989年,第550页。

④[美]邹说《历史性转变和过去的连续性(下)》,《党史通讯》1984年第11期。转引自马启民《国外邓小平理论研究评析》,济南:山东人民出版社,1999年,第363页。

⑤[美]J·德雷尔《邓小平的军事思想》,《国外中共党史研究动态》1994年第3期。

⑥[美]J·德雷尔《邓小平的军事思想》,《国外中共党史研究动态》1994年第3期。

⑦[英]理查德·伊文思《邓小平传》,田文译,第269页。

⑧[英]理查德·伊文思《邓小平传》,田文译,第271页。

⑨[澳]大卫·古德曼《邓小平政治评传》,田西如、李学谦、姜丽蓉译,第193页。

⑩[美]傅高义《邓小平时代》,冯克利译,第526—527页。

⑪[美]保罗·肯尼迪《大国的兴衰》,蒋葆英等译,第550页。

⑫[美]傅高义《邓小平时代》,冯克利译,第520—522页。

域——导弹、卫星和潜艇——重点也仍是放在技术研发而不是大规模的生产上,只期望在必要时能够迅速生产更多武器”,“在邓小平时代,这类系统的部署一直以适度的规模进行”。^①对于邓小平推进中国军事现代化的举措,傅高义最终评价道:“通过把军事冲突的风险控制在低水平上,邓小平成功推动了经济的快速增长,也没有危及国家的安全”,“邓小平给接班人留下了一支规模更小、教育水平更高、对现代战争的要求理解更深刻的军队,以及一个更强大的民用经济与技术基础,使他的接班人得以继续致力于军事现代化”。^②

5. 关于邓小平的革命战争生涯。国外学者对邓小平革命战争生涯的研究普遍比较重视,而且尤为重视抗日战争与解放战争期间邓小平的军事活动。古德曼认为,邓小平作为军事家,“在太行区和刘伯承之前,他的军事经验是很有限的,并且也不太成功”,“出于政治的原因而不是军事的原因,邓小平在 1938 年初被任命为一二九师的政委”。然而,在抗日战争中,邓小平的军事指挥和领导能力获得了巨大认可,“邓在军队中的第一个成绩就是在人力、物力、资源贫乏的基础上,建立了一支强大的、人数众多的武装力量。这支武装力量,后来变成了第二野战军”。^③

伊文思则认为,从 1936 年担任红 1 军团政治部代主任开始,邓小平的“事业进入了一个崭新的时期,在以后的 16 年中,他的名字传遍全党全军,显示出他有资格成为一名国家领导人”。^④伊文思展开论述了邓小平作为一名重要决策者参加的许多著名战役,如抗战期间的百团大战,刘伯承和邓小平率领 38 个团参加,“给日、伪军很大打击”^⑤;重庆谈判期间的上党战役与邯郸战役,表明了“共产党不允许国民党的军队在其解放区进行战略行动”^⑥;解放战争期间刘邓大军先是“掌握着南部前线至关重要的防区”,而后“向南挺进,直插位于南京和武汉之间的大别山区,深入到了国统区的内部”,“邓小平率领部队开始了在大别山艰苦奋斗的岁月”;推动邓小平的军事生涯“达到了光辉的顶点”^⑦的淮海战役,等等。

国外学者普遍认为,革命战争年代是邓小平人生中最辉煌的历史之一,对他新中国成立后的发展以及军事思想的形成发挥了重要作用。古德曼认为,邓小平军事家地位的确立,并不是因为他在新中国成立后先后担任过国防委员会副主席、军队总参谋长、军事委员会主席,“而是因为他在 1938—1952 年期间长期的军事生涯”^⑧,“邓在 1938 年后,作为一个军事指挥员的角色,对他 1949 年后的生涯起了重要的作用”。^⑨古德曼还认为,从 1942 年 9 月兼任中共中央太行分局书记开始,尤其是在 1943 年 10 月代理中共中央北方局书记,同时主持八路军总部工作期间,邓小平在华北敌后抗日根据地实施的很多政策与改革开放后有相似之处,如“在税收制度中,与邓小平八十年代的改革相类似的一个有趣方面是:个体经营者按照他们前几年平均生产值纳税,剩余的部分全归他们自己。另一个与后来的改革相类似的是邓所推广的‘责任制’,这种责任制是通过签订一个合同把公有土地承包给个人,超出合同之外的任何剩余部分都归生产者所有”。^⑩古德曼认

①[美]傅高义《邓小平时代》,冯克利译,第 525 页。

②[美]傅高义《邓小平时代》,冯克利译,第 531 页。

③[澳]大卫·古德曼《邓小平政治评传》,田西如、李学谦、姜丽蓉译,第 216 页。

④[英]理查德·伊文思《邓小平传》,田文译,第 96 页。

⑤[英]理查德·伊文思《邓小平传》,田文译,第 104 页。

⑥[英]理查德·伊文思《邓小平传》,田文译,第 119 页。

⑦[英]理查德·伊文思《邓小平传》,田文译,第 122—127 页。

⑧[澳]大卫·古德曼《邓小平政治评传》,田西如、李学谦、姜丽蓉译,第 214 页。

⑨[澳]大卫·古德曼《邓小平政治评传》,田西如、李学谦、姜丽蓉译,第 217 页。

⑩[澳]大卫·古德曼《邓小平政治评传》,田西如、李学谦、姜丽蓉译,第 78 页。

为,“邓小平1943年7月发表的《太行区的经济建设》的文章,不仅是共产党在敌后游击战略宗旨的典范——强调了经济生产与取得政治及军事胜利之间的重要关系,而且还系统地概括了邓小平今后总的思想的发展,也是他的经济现实主义的一个典型范例”,“邓小平在太行区的工作经历肯定形成了他的政治思想及观念,毫无疑问,同时也在他的周围成长了一批贯彻他的这些思想并在今后更广的范围内实践他这些思想的干部”,“邓在太行区共事的许多人在八十年代的改革开放中扮演了重要的角色”。^①

伊文思则认为,邓小平在革命战争生涯中扮演了双重角色,“邓小平既是一个政治军人,同时又是一个军人政治家。作为一个政治军人,他的工作是确保军队相应政治教育和训练。作为一个军人政治家,他的工作是确保党能了解军队的实际,而不会对军队提出的要求太多或太少”,“和毛泽东一样,邓小平认为这一工作所扮演的双重角色非常适合他。他丰富的经验使得他成为一名高明的政治家,他的性格又使得他很适合军队生活”。^②伊文思通过研究《邓小平文选》中收录的邓小平20世纪40年代的讲话和文章,认为“邓小平思想坚定,能很好地抓住论点,处理和解决问题不墨守成规。他重视事实和数字,并且努力学习,使自己成为贸易税收方面的专家,而这些是他从未涉及过的。他处理所有经济工作的原则是:‘限制过去残酷剥削的程度,……但鼓励资本主义生产,这在目前对发展国民经济是有益的’。他的这段话有两个特征:一个是他对‘资本主义生产’没有委婉其词;第二,他在‘有益的’前面加上‘目前’这个词,清楚地说明共产主义并不会永远容忍资本主义。”^③

6. 关于邓小平在新时期若干军事事件中的重要作用。这方面国外学者普遍比较关注邓小平在对越自卫反击作战、与美国军事合作等军事事件中的作用。

关于对越自卫反击作战。傅高义认为这场战争在中国是“被遗忘的战争”,因为他认为“中国没有关于这场战争的公开讨论”。^④他指出,在战前,邓小平“遭到了中央军委其他成员的普遍反对”,但邓小平坚信“中国必须对越南入侵柬埔寨做出强硬反应”,以及“必须对苏联威胁做出强硬反应”。^⑤关于作战情况,傅高义认为,在一定的战前准备与外交努力的前提下,虽然“中国军队人多势众,决心坚定,确实攻下了5个省会,但伤亡人数远高于越南”,而且这场速决战、歼灭战暴露了人民解放军的诸多问题,“他们缺少情报,与上级通讯不畅,无法迅速采取行动。各部队之间的协调也很差,供给线拉得太长”。对此,傅高义评论道,“解放军很难为它的表现感到自豪”。^⑥对战争影响,傅高义认为此战达成了4个重要目的:1. “就像下围棋一样,邓小平要阻止苏联和越南占据空间围住中国,同时又要护住自己的眼位(作者注:指1984年中国阻止了越南进入泰国进而染指重要的马六甲海峡)”;2. “使苏联在为越南提供更多援助时变得更加谨慎”,而越南则“为保卫其边境耗费了大量资源”,“未能实现它称霸东南亚的野心”;3. “增强了其他东南亚国家抵抗越南野心的信心,他们知道中国会像帮助柬埔寨和泰国那样帮助他们”;4. “邓小平确实利用军队在越南战争中的糟糕表现强化了他自1975年开始的工作:让无能的军官退休,严肃纪律,增加军事训练,使用教育程度更高的军官”。^⑦对此,古德曼也表达了同样的观点,“邓小平做出解放军必

①[澳]大卫·古德曼《邓小平政治评传》,田西如、李学谦、姜丽蓉译,第79—81页。

②[英]理查德·伊文思《邓小平传》,田文译,第97页。

③[英]理查德·伊文思《邓小平传》,田文译,第105—106页。

④[美]傅高义《邓小平时代》,冯克利译,第514页。

⑤[美]傅高义《邓小平时代》,冯克利译,第508—510页。

⑥[美]傅高义《邓小平时代》,冯克利译,第512—513页。

⑦[美]傅高义《邓小平时代》,冯克利译,第514—516页。

须改革的决定很可能是在 1979 年对越战争之后,那次军事行动没有得到令人满意的结果”。^①

关于与美国军事合作。傅高义认为,“邓小平从未表示过他有跟美国结盟的考虑,就像过去的毛泽东一样,他希望中国的安全问题上完全独立。但他确实想通过中美合作获得更多现代军事技术”,并且这一想法在 1979 年会见卡特总统时就提到过,“邓小平从越南撤军后,有关这种合作的会谈有所升温”,因为“尽管美国不会向中国出售尖端武器,但同意以个案方式考虑出售若干军事设备——苏联在 1979 年 12 月入侵阿富汗,这支持了那些希望通过加强美中合作向苏联施压的人”。^② 在 1980 年 5 月国防部长耿飚访美后,“两国间的技术交流开始起步,在战略问题上也有了更广泛的合作基础”,“包括中美国防部长的互访,向中国的技术转让和武器出售,以及学术专家和考察代表团的互访”,“虽然这些互动无法跟美国与日本和韩国军事交流的层次相比,但双方确实形成了良好的工作关系。”^③

三、国外邓小平军事思想与实践研究的不足

受到客观上研究队伍弱小、掌握资料有限,以及主观上文化背景差异较大、价值评判标准不一、研究思维与方法不尽完善等因素的影响,国外学者对邓小平军事思想与实践的研究存在明显不足。

第一,研究不够充分。首先,相对于邓小平政治、经济的研究,国外关于邓小平军事思想与实践的研究力度和成果总体偏少,专著、专论更是凤毛麟角。

其次,研究缺乏完整性。通过本文第二部分不难看出,尽管国外学者对邓小平军事思想与实践已有广泛涉猎,但仍然是不完整的。他们普遍对邓小平关于“要把教育训练提高到战略地位”“始终不渝地坚持人民军队的性质”“提高军队建设的正规化水平”等方面的思想和实践缺乏认识。比如,傅高义作为研究邓小平新时期军事思想与实践较为充分的国外学者,他的著作对邓小平的军队教育训练思想也只是简单带过:邓小平认为“不打仗,部队军事素质的提高就得靠训练”,“邓小平还继续他在 1975 年开始的恢复和扩大军事院校的工作”,“与美国和苏联军队相比,中国针对高技术战争开展的部队培训计划仍处于早期发展阶段”。^④ 此外,对于邓小平所提出的我军“三化”建设目标,国外学者几乎无一例外只关注现代化,而忽视革命化与正规化,反映了在理解上的片面性。

再次,研究缺乏专门性。国外邓小平军事思想与实践的研究大都零散地“隐藏”在对邓小平生平活动的考察与评论之中,虽然史实不少,但普遍缺乏军事思想或实践方面的专门考察;虽然观点不少,但普遍缺乏贯穿整个研究的观点或主线。同时,并不是所有国外学者都重视研究邓小平军事思想与实践。比如在匈牙利人巴拉奇·代内什的著作《邓小平》中,作者没有对邓小平新时期国防和军队建设的内容做任何陈述,对邓小平的革命战争生涯虽着墨较多,但侧重的却是对整个大时代的描述,对邓小平在其中担负的军事角色缺乏分析与评价。^⑤ 此类问题,德国人乌利·弗兰茨的著作《邓小平传》^⑥也同样存在。

第二,认识不够深入。尽管国外邓小平军事思想与实践研究不乏观点突出、特色鲜明之作,但

①[澳]大卫·古德曼《邓小平政治评传》,田西如、李学谦、姜丽蓉译,第 192—193 页。

②[美]傅高义《邓小平时代》,冯克利译,第 518—519 页。

③[美]傅高义《邓小平时代》,冯克利译,第 520 页。

④[美]傅高义《邓小平时代》,冯克利译,第 527 页。

⑤[匈]巴拉奇·代内什《邓小平》,阙思静、季叶译,北京:解放军出版社,1988 年。

⑥[联邦德国]乌利·弗兰茨《邓小平传》,天力、李强译,兰州:甘肃人民出版社,1989 年。

是相对于国内邓小平军事思想与实践的研究,则显得认识层次较浅。首先,国外学者对军事实践的史实描述多于对军事思想的深入分析。国外学者比较重视邓小平生平活动研究,并取得相当成就,但因此也导致实证考察大于理论分析。再加上国外学者普遍对中国国情及中国军队实际缺乏深入把握,因此论述往往就事论事,难以从宏观上、本质上揭示邓小平军事思想与实践的内涵。

其次,国外学者的研究思维容易出现“碎片化”倾向。比如对军队现代化的认识上,傅高义只是一味强调邓小平是在“推迟军事现代化”,并利用一些国防预算中“军队可以使用的资金其实是下降”的数据资料证明,中国该阶段军事现代化是完全让路于其他现代化的观点,而始终未将邓小平开展军队体制编制调整、改革军工体制、发展教育训练和军事科研等思想和实践放在推进军事现代化的道路上一并思考。

再次,国外学者缺乏对相关概念的深刻把握,对有关问题容易造成曲解。比如对积极防御思想的理解上,一些国外学者就认为“邓小平军事思想在考虑到现代战争的特点而放弃了积极防御的战略方针”,将“积极防御的方针同前沿防御对立起来”,甚至认为中国“修改它的防务学说已经由自卫变成攻击”。^①显然,这是由于他们缺乏对积极防御内涵的深刻把握,缺乏对中国军队积极防御历史和现实的深入考察,从而形成了简单片面的论断。

第三,观点不够准确。由于国外学者经常自觉或不自觉地将他们固有的价值观念强加于学术研究之中,因此在理解邓小平理论体系与实践活动的丰富内容时,容易否定其马克思主义性质和误解其社会主义价值取向,进而产生一些不准确的观点。

首先,国外学者过多强调家庭背景、个人经验、性格气质等影响因素,过分关注人际关系的演变。如古德曼认为,邓小平使其“原来一二九师、太行区和第二野战军的部下……在解放军中获得了重要职位”,“此外,邓与他在太行区和第二野战军的老部下继续维持的关系,决不仅限于军队事务,这种关系逐渐在军队以外的政治生活中发挥了重要作用”,“当他在政治上陷入麻烦时,他在军队中的良好群众基础不止一次地给他提供了帮助”。^②显然,这样的论述没有深挖历史现象背后历史规律和历史选择的客观必然性,从而易使研究滑向历史唯心论的泥潭。

其次,国外学者经常从权力乃至派别斗争的狭隘角度考虑问题。比如傅高义认为,“所有中共领导人都不断说‘党指挥枪’,但毛泽东和邓小平很清楚,在关键的权力斗争中军队主要领导人的忠诚至关重要。因此邓小平既要通过正式制度控制军队,也要抓个人控制”。^③在关于对越自卫反击战的考察中,傅高义指出,“北京的一些干部相信,邓小平发动并具体指挥了这场战争是为了使他在掌权后加强对军队的个人控制”,“无论是这次进攻的战略思考还是战争目的及规模的确定,都是来自邓小平本人。……这是一场邓小平的战争”。^④如此认识对越自卫反击战,无疑是有悖战争本质与历史原貌。

再次,国外的研究不乏无依据的主观臆断。在认识邓小平与毛泽东在军事思想与实践的关系方面,国外学者大都主观地强调两者的独特性,将两者简单对立,主观割裂开来。比如对人民战争思想的理解,有的国外学者直接认为由于邓小平强调军事现代化建设,因此“在1978年上台的邓小平拒绝了人民战争的想法”,^⑤德雷尔虽然认为邓小平以现代条件下的人民战争取代了以往的人

①[美]J·德雷尔《邓小平的军事思想》,《国外中共党史研究动态》1994年第3期。

②[澳]大卫·古德曼《邓小平政治评传》,田西如、李学谦、姜丽蓉译,第218页。

③[美]傅高义《邓小平时代》,冯克利译,第522页。

④[美]傅高义《邓小平时代》,冯克利译,第510—511页。

⑤金羽、李慧让、温乐群《海外人士心中的邓小平》,北京:红旗出版社,1993年,第389页。

民战争,但却认为这一思想的内涵另有“深意”:“虽然这一思想被说成是将毛的原则运用于当今的条件,但大多数分析家认为它是与过去的决裂,只保留了原来的名字,为的是模糊这一决裂在意识形态上的影响”。^① 傅高义则认为“现代条件”的含义之一是“军队应当放弃毛泽东时代由政委承担的政治工作,并把这些工作移交地方,军队只集中精力完成军事任务”。^② 可见国外学者惯于使用纯西方的现代化理论框架对邓小平军事思想与实践进行任意剪裁,既无任何客观根据,更缺乏对中共军事指导思想与实践创新发展的深刻认识。

结语

综上所述,改革开放至本世纪初是国外邓小平研究的集中爆发时期,国外邓小平军事思想与实践研究在这个阶段也最为丰富,笔者所收集到的资料绝大部分都集中在这一时期。此后,随着时间推移和研究热点的转移,国外邓小平研究曾出现一定程度的“降温”,直到最近才有傅高义的《邓小平时代》一书问世。笔者认为,在短期之内国外邓小平军事思想与实践研究再想取得较大进展,也存在一定难度。就本文而言,由于作者收集资料的渠道和能力有限,可能有其他重要国外研究成果未能掌握,恳请学界同仁指正。

(责任编辑 仲 华)

^① [美] J·德雷尔《邓小平的军事思想》,《国外中共党史研究动态》1994 年第 3 期。

^② [美] 傅高义《邓小平时代》,冯克利译,第 524 页。